

王晓昕 李友学 主编

传统文化

与

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之蘭亭脩禊事

道德建设



觴一詠之暢叙幽情

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王晓昕
李友学
主编

传统文化

与

道德建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王晓昕, 李友学主编.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412-1221-0

I . 传... II . ①王... ②李... III . 传统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 G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5140 号

书 名: 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

编 者: 王晓昕 李友学 主编

ISBN 7 - 5412 - 1221 - 0/C · 93

责任编辑: 潘 选

封面设计: 吕凤梧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5.5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序

秦家伦

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形成了丰富的全面的道德规范，孕育了优秀的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国家，在21世纪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既然能够历数千年而不衰，经过多少次劫难而不断显示其辉煌，其中必然包含符合人类社会恒久需要的因素，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体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穷本探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顽强精神，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重视人格道德的人文精神，等等。这些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渗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与中华儿女们的处世态度、思维模式、行为标准、道德情操等融为一体。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承，要在新时期不断发扬光大。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也毫不隐讳地说，确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如“三从”、“三纲”等是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早已被批判、唾弃。但有些传统文化如“孝”文化，既有正面作用，同时又有负面的影响。“孝”是建立在亲子

血缘基础上的文化,通过“孝”文化可以衍生出具有人道主义的合理意义的“尊老爱幼”的行为准则。子女对父母尽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人生道德,也是我们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中倡导的家庭道德之一。但“孝”也可能衍生出削弱人权平等、限制人格自由的“尊卑有序”的人格模式。特别是封建社会时期的“三纲”之说,否定了子对于父的独立人格,在历史上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所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道德,应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根据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选择其中有用的成分,服务于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最近,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将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这是中央文明委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切实加大思想道德建设力度,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道德基础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我们要以此为契机,开展形式多样的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浓厚氛围。

公民道德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高尚道德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建设。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目前在道德建设中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在经济活动中,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搞假冒伪劣等现象屡禁不止;在社会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部分党政干部中,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种状况与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形势不相适应,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广大人

民群众早已对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要求党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打击犯罪分子,杜绝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深入开展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的活动,引导人们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加强诚信教育,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倡导扶贫济困,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要深入进行科普宣传,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广泛地动员和吸引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关心、自觉参与道德建设,不断增强道德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实现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扩大开放、建设大贵阳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作者:中共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序 秦家伦(1)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传统哲学与当代道德	(1)
二、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历史的演化与创新	(12)
三、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在创造活动中的彰显	(23)
四、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儒家思想的诠释	(29)
五、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	(39)
六、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十六字	(61)
七、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弘扬进取勇为的精神	(68)

第二章 诚信的思考

一、诚信的思考: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73)
二、诚信的思考:市场经济的呼唤	(81)
三、诚信的思考:传统视域的现代价值	(89)
四、诚信的思考:打造诚信贵阳 全面建设小康	(104)
五、诚信的思考: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117)
六、诚信的思考: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现代意义	(121)
七、诚信的思考:诚信与“三个代表”	(128)

八、诚信的思考：爱情为基础 诚信是关键	(134)
九、诚信的思考：企业文化与儒学精神	(143)

第三章 传统与现代

一、传统与现代：现代人道德价值取向及发展趋势	(154)
二、传统与现代：现实贵州的先进文化建设	(164)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转换的人本主义思考	(172)
四、传统与现代：“中庸”思想的现代意义	(178)
五、传统与现代：权利伦理一谈	(186)
六、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宗教·新时期的社会道德	(191)
七、传统与现代：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199)
八、传统与现代：“两课”教师与“三进”工作	(205)

第四章 德治与法治

一、德与法：孔孟德治思想的现代反思	(210)
二、德与法：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218)
三、德与法：儒家学说的历史借鉴	(235)
四、德与法：德治思想的价值诠释	(243)
五、德与法：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250)
六、德与法：德法并治模式的思考	(259)
七、德与法：传统文化的可鉴性	(266)
八、德与法：“以德治国”的内涵	(275)
九、德与法：“以德治国”的实现途径	(281)
十、德与法：“德”的重要性与伦理道德观的与时俱进	(285)
十一、德与法：德法并用 双轨治国	(289)

第五章 “官德”与“民德”

一、论“官德”:在西部大开发中构建“民生第一”的道德政府	(293)
二、论“官德”:做官先做人	(304)
三、论“官德”：“官德”与“民德”的关系	(310)
四、论“官德”:道德与“官德”	(315)
五、论“官德”: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	(318)
六、论“官德”:会议的道德	(332)
七、论“民德”: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	(346)
八、论“民德”:档案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350)
九、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356)

目
录

第六章 孝文化的现代诠释

一、孝的诠释:儒家孝文化与现代家庭道德	(364)
二、孝的诠释:孝道与现代家庭道德	(376)
三、孝的诠释:“孝”的价值与现代转换	(385)
四、孝的诠释:说孝	(393)
五、孝的诠释:“孝悌”的现代意义	(398)
六、孝的诠释:中国传统家庭道德教育观	(402)

第七章 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

一、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发掘资源 促进建设	(411)
二、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论王阳明的“心上功夫”	(416)
三、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心学之我见	(425)

四、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知行合一”的现代意义	(441)
五、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致良知”的现实意义	(447)
六、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王阳明的诚信警言	(453)
七、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经济新思维的凸现	(456)
八、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李渭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	(460)
九、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戴震的“反躬思虑”思想	(466)
十、阳明文化与道德建设：传统士子的忧国忧民情怀	(472)
结语	(483)

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传统哲学与当代道德

江泽民同志指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必须实行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他还指出，要做到这点，必须实行“走进去、走出来”的方针。因此，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既要把握时代的发展大趋势，与时俱进，又要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精神，才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一）走进传统：掌握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

“走进去”，就是要立足本土，立足传统。只有准确地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才不会忘记过去，才有立足点，也才能展望未来。

首先，天人合一思想。道家认为，人与宇宙互不外生，二者相类相协，通为一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是一体贯通的。因此，“泛爱万物”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以此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儒家

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天道与性命”的一致，从孔孟到程朱陆王无不主张超越的天道或天理与内在性命或人道的统一。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里，从获得内在与天道的超越性出发，进而达到“不思而得”，最后获得内在与天道完全融合的“内在超越”境界，这正是儒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孟子由人的内在性推向天的超越性，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程朱由“天理”推得“人性”，提出“性即理”的论断。陆王则由“人性”推向“天理”，提出“心即理”的主张。总之，他们都认为天与人是一体贯通的。

其次，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因此就认为要获得天道只需研究人道就行了，不必追究离人很远的自然之天或神灵之天。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以人生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在孔子看来，人应该知并能够知的是人自己，爱人、事人是人的本分，不必去追究鬼神和自然怪异之事。墨家和法家也重在人世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即使是道家高扬自然、天道，也依然是讲人世间生活、欲望、情感、理想怎样才能算合乎自然的道理。佛教禅宗同样是讲求在人生实践中修养佛性，成就佛性。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天人合一的追求，就其实质而言，并不在于正确处理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关系，而在于立足人事，探求人生的“天性”和“人为”的关系。老庄认为，儒家主张仁义礼智，是把人为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天性，扭曲损害了人自身的自然性，只有返璞归真，依天性而为，才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在荀子看来，人的天性本恶，必须依靠人为的仁义礼智加于人的天性，使之向善，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可见，天人合一从根本上说，乃是对“生活之道”、“人生之道”的追求。由于这种根本的“哲学关怀”，中国传统哲学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致力于怎样“成人”、“成圣”、“成佛”的主体价值的建立，而不知注重怎样探索外在真

理,揭示宇宙或天地奥秘。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独具辩证法色彩的人生智慧观,道家“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从反面做起的处世哲学,就表现了一种明智的生存态度;而孟子“养浩然之气”,荀子以礼义修正性恶,宋明理学家以主敬主静作为立身之道,则表明了一种刚健中正的人生态度。

再次,维护整体观念。中国的先哲们历来就有一种对国家、对社会、对别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诗经》提出“夙夜在公”,认为日夜为公就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西汉的思想家贾谊提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强调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强调为整体而献身。范仲淹坚决表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高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他们表现出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已深入人心,代代相传。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逐步凝结成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

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中国传统哲学提出“和为贵”的基本准则。先秦的荀况认为,人之所以能“胜物”而“为天下贵”,就在于“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注重在人际交往中和谐融洽,相互关心爱护,因而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

还有,中国传统哲学贯穿着道德规范与艺术境界的统一。在孔子看来,“仁”为人道,亦为天道。在孟子看来,天道与人道统一,其本为善。可见,儒家之天实为伦理道德之天。庄子把人的“性”、“命”归之于天,把人的文化制度归之于“天”,提出“天在内,人在外”。这表明,在道家看来,只有合乎自然而然之理的人间生活,才是天人合一的道德生活。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其根本在于道德,在于追求一种完美的艺术境界。从而,确立自主的人生观,肯定生命的意义在于建立内在的道德自我,而不在于经营外在的客观世界;人的价值在于成就光明磊落的精神自我,而在

于拥有荣盛繁多的物质生活。儒家理想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要先从内圣功夫做起，然后才能达到外王之境。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不是人性中的理性特色，而是道德人格，有“人是道德动物”、“人是有情动物”的说法。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在于肯定人的价值或道德的主体性，因此，道德伦理色彩十分浓厚。正因如此，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不是表现为理性的认识结果，而主要是一种体悟到的无限的、永恒的境界，这种追求使得中国哲学贯注着一种浪漫的艺术精神。艺术精神在于移性游心于物，然后进行审美观照，游离于形象之外达到空灵之境，在若有若无之间，与物俱注，物我两忘，全然无相对待。这种艺术境界正是道家所追求的。道家视道亦有亦无，存在于希夷恍惚、虚无寂寞之境。以道无乎不在，齐万物得出齐是非，忘生死，一物我。物我之别已忘，游心于万物，与天地一气，正是观天地之美的艺术境界，可见，道家的自然主义最终归于美。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精神同样与艺术精神结合在一起，孔子的仁学以德为核心，向外延伸则为礼乐，仁立于礼成于乐正是孔子精神追求的完美境界。宋明理学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对艺术境界的追求表现得也较为明显。

最后，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决定了它以直观、领悟、体验为根本途径和主要方法。无限的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和人生向往不可能靠科学的理性思维获得，而只能求助于整体直观和心灵体悟。人生要成人、成佛、成圣，要成就道德人格和完美人格，不可能靠逻辑归纳或演绎获得，而只能在直接的体会和直观的力行中得到。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讲求省悟、神会、修身、养性、践履等，所讲的实践往往也就是指这些方法，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国传统哲学所注重的这种精神历程的寻觅常带有玄秘莫测、不留形迹的特点，有时甚至难以用语言形容，正如辛弃疾所说的：“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庄子就只用比喻来表达得道的生活，以天籁、天乐象征得道的境界。而道家的“道”

也从来只有形容性的描述,如“无状之状”、“无象之象”,却是无分析的规定。儒家孜孜以求的精神人格,也很少在抽象理论规定方面给以逻辑的层层辨析,而只能在心领神会和身体力行中来把握。至于佛教禅宗则从根本上否定文字的功用,有“说即不中”的名语。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自然只能通过“神与物游”,在拥抱自然与天融为一体时才能体察。于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面对无限的宇宙人生,则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只有在齐物我、合天人的神思中,才能达到对宇宙和人生真谛的顿悟。

(二)走出传统: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特别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沉思。

西方工业化进程将西方带入了一个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的社会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多。”的确,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用“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等词汇来形容似乎都不足以表达。这些极度繁荣的物质文明也让曾经长期闭关锁国、口称老大的中国人瞠目结舌,震惊于自己的落后。然而,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在沉浸于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高的喜悦中的同时,也逐渐发现周围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西方的工业文明。西方极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与其深厚的文化(哲学)根源是密不可分的。西方人自古以来就注重天人二分,将“我”与外在世界对立起来,崇尚人的理性认知能力,注重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是极富成果的。这也是近代西方物质文明得以极度繁荣

的根源。

强调主客二分,从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开始,就高喊“人是万物的尺度”,将人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界的主宰,毫无节制地开发、破坏自然资源。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大量的自然资源被破坏为代价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被忽略、破坏了。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接踵而来。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的发展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以高投入换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同样导致能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目前,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已成为人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些危及人类生存的危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不显示出其优越性。天人合一,寻找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共同发展,正是现在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有识之士所希望达到的。

西方哲学注重对外界世界的探索研究,主张人在这种探索活动中的个性独立与解放,由此创造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强盛。但是,也正是因为主客二分,把人也分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过分强调人的理性认识功能,而将情感、意志、欲望等非理性因素从人的整体中分离开来,孤立开来,忽视甚至否认了主体的情感、意志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人实际上也被看作抽象的、理性的人。因而,人的生活实际上也是片面的、抽象的,人的真正本性被掩盖了。所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的理性的膨胀,另一方面人也越来越成为科技的附属物,成为他的对象的对象,异化现象相当严重,从而也引发了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对峙。人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不断显露,家庭危机、自杀率升高、吸毒、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现代的西方社会已成为一种严重的时代病。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要连同引进其并生的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和种种社会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我国社会中,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经济体制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一些社会矛盾已经显现，盲目引进西方哲学思想恐怕只会激化这些矛盾。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中国传统哲学的博大精深，我们惊喜于先哲们超人的智慧。重视人，重视人自身的内心修养，修身养性，正心诚意，行内圣外王之道，肯定人生的意义在于建立内在的道德自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经世致用，注重为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各种规范和法则。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优势所在。

实际上，西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也为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哲学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他们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片面强调理性、忽视非理性因素的局限，转而力图从人自身的情感、欲望、意志去寻找解决西方社会问题的途径。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提出建立超人哲学，并为此发了疯。萨特在宣布“他人是地狱”之后同样也提出了道德责任学说。

再看我们当今的中国。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国际进行多方面接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很频繁而广泛，从而也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增长了见识，活跃了思想，使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使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沉渣泛起了。社会存在发生的变化，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社会上，青少年犯罪、吸毒、精神生活空虚、家庭暴力、社会风气败坏等等社会现象到处可见。正因如此，我们在加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